

[I]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 建构主义与“认识的客观性”

与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领域更致力于在方法论上结合目的性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与“认识的客观性”，并且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比如文化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1955年首先提出的建构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斯特劳斯对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观进行了相对化，强调在与现代西欧同时代的其他地域空间里，看似尚未开化的社会所拥有的世界观也具备一定程度的完整的构造体系，并在这一点上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观具有同等资格。⁵在这里，作者对于将看似未开化的社会和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按照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纵向排序，将前者的世界认识视为幼稚、落后的社会，而将后者视为成熟进步的社会，这种持续至今的“常识”进行了彻底反省。斯特劳斯认为处在同时代横轴的辽阔空间里的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都以同等地位、同等价值的资格存在，这些世界观拥有的“认识的客观性”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优劣之分。

以某个特定文化体系下之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客观性”，与以其他文化体系下之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客观性”可以说基本上是等价的。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世界观框架确立的对世界的各种认识可以同时并存，因此不可能决定到底哪一种世界观更可以“客观”地认识世界。⁶

(2) “范式史观”与“认识的客观性”

科学史学家度恩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了同样的方法论尝试。1962年，度恩提出了引起很大争论的“范式史观”，他从历史纵轴的时间广度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某个时代的世界观与其他时代的世界观，也即不同时代的复数世界观之间是平等的，具有同等价值，不承认它们之间有认识上的累

积性递进关系。⁷

总之，度恩认为历史上的世界观的转变，并不是在前一个时代世界观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积累而产生的认识进步的产物，仅仅是将以前观察世界所用的特定的有色眼镜摘下来，换上一付别的有色眼镜重新观察世界所导致的认识变化而已。⁸

不管是斯特劳斯还是度恩，他们都首先承认，由于人们只能依据受到其所在社会的地域空间以及历史事件制约的世界观来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或者说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有色眼镜认识世界，并认为戴上这样的有色眼镜并不能说就导致缺乏“客观性”的错误认识。在这里仅仅就是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通过各种各样的有色眼镜所观测到的不同世界的意象而已。因此，究竟谁更加“客观”、正确，谁缺乏“客观性”、是错误的认识，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

让我们看一个更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拿只能分辨出七种颜色的人类与可以分辨出包括紫外线、红外线等十种颜色的动物作比较，显然不可能存在一个决定人类与动物之间谁认识到的世界更带有“客观性”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人类即便抱着特定的目的性意识，或者伴随着这种意识已经拥有了在一定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所描绘的世界观——任何世界观都是在目的性价值判断基础之上建立的——，也不能就此推定人类的认识缺乏“客观性”。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人类的世界观都是在多少要受到地区、历史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才建立的，因此“客观性”只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客观性”的世界观。

(3) 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与现代科学的诞生

但是我们还必须提及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的确，人类的世界观包含跨越时代与地区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戴上了有色眼镜），尽管如此，在西欧现代科学出现以前，这种目的论并不一定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各种拜物教（animism）为起源的古希腊泛神论就是这种（非人

类中心主义) 世界观的典型, 其特征就是以与自然相融合协调为基础的“自然中心主义”, 这种世界观将由自然和与自然融合了的人类所形成的现存世界(世俗世界) 作为有价值观之目的主体并予以肯定。因此以这种泛神论为背景的世俗世界的霸者——皇帝, 比如古代中国各个王朝的皇帝就被奉为承担天命(现存世界的目的) 的天子(天人合一论)。日本古代的天皇制也有“天人合一”的特征。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里的目的论是由自然本身和与其融合了的人类共同构成的现存世界所承担的。⁹ 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分子, 总是处于自然中, 并持续着以与自然共生为前提的与自然的“对话”。

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在一神教的背景下, 世俗世界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罗马教皇手里, 确立了教皇权, 于是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教皇权下, 由自然世界与自然一分子的人类世界构成的现存世界或世俗世界变得没有价值, 并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念, 超世俗的神圣教会应该取代世俗的皇帝权力统治世俗世界。¹⁰ 当然, 在这里人们将唯一的神——创世主耶稣与他的创造物与现存世界(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 作了区分。世界的目的论也因此从以前的“自然中心主义、现存世界中心主义” 转由“(一) 神中心主义” 的教会和教皇来承担了。

但是, 本来应该以超世俗、神圣的内在精神性而存在的教会逐渐不再满足于统治内在的超世俗世界, 也试图插手支配外部的世俗世界(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正是这种自我矛盾逐渐使教会自身的神圣性和超俗性走向衰竭, 并产生了这样一种压抑性, 本来应由内部(精神) 权威支配的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却又要受到外部权威的支配。结果教会走上了引发路德、加尔文(Jean Calvin) 等号召宗教改革的不归路。过去的“神中心主义” 走向了溃灭, 出现了新的“人类中心主义”。¹¹

近代欧洲的“人类中心主义” 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特别是在近代西方科学中被浓重地体现了出来。原来中世纪的“(一) 神中心主义” 观认为, “正是(唯一的) 神为了人才创造了

万物(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构成的现实世界)”, 但是“人类中心主义” 却将其中的神去掉了, 突出了人类的优越地位, 将人类置于万物(现存世界) 的中心, 登上了“神座”。此时人类世界被从现存世界中剥离出来, 取代了过去神的地位。就是说“如果去掉了中世纪(唯一的) 神的超越性, 近现代即跃然而出”。¹²

(4) “科学实验” 的目的

如此走上历史舞台的“人类中心主义” 成为了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基础。它体现了将人类世界与现存世界中和自然世界相剥离、人类应该支配自然世界也就是登上“神座” 的要求。此时作为科学对象(客体) 的自然世界与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类之间的区别已经泾渭分明了。¹³ 这种主客体的分裂使得近现代西方科学的科学实验目的只限于对自然世界作单纯的认识、观察(watching), 而不去尝试模仿自然世界。

因此, 科学实验的目的就超出了认识和模仿自然世界的层面, 而强调“神座” 上的人类的计算(带有目的的价值判断来重新编排、改造成为科学对象的自然世界)。在科学实验中认识自然世界——其目的并不在于观察和模仿, 而在于通过科学实验为重新设计和构筑自然界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于是实验室成了与外部鲜活的自然世界的时间、空间相区别的时空, 产生了与外部自然界隔离的“密室性” 特点。但是, 实验室的密室性特点有两个问题。

第一, 由于实验室为了将自然界的一部分挑选出来并对其进行人为的再造, 因此有可能产生本来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变形。这种变化或变形对外部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是否有利, 会不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崩溃, 都没有任何保证, 而只能单方面地依靠实验者的主观伦理道德了。

第二, 为了使实验者人为再造的变化或变形了的一部分自然不对实验者产生反作用, 实验室采用了严格的管制措施, 设立了隔离预防装置(shield)。这样, 作为实验者的人类与作为实验对象的自然之